

子林漫錄

九集



漫 林 学 录  
九 集

中 华 书 局

封面题签 张伯驹  
封面设计 谈冰玉  
编辑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

学 林 漫 录

九 集

\*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9 3/4印张·230千字

1984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翻北第2次印刷

印数 11001—14000册 定价：14.00元

---

ISBN 7-101-01739-8/I·292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蓼园问学记 .....         | 牟润孙 (1)   |
| 胡小石师的教学艺术 .....     | 周勋初 (10)  |
| 记曾星笠(运乾)先生 .....    | 金克木 (22)  |
| 忆苏继庠先生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并记石涛《画谱》的出版 ..... | 吴铁声 (28)  |
| “哀死宁生”话自沉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观堂遗事片断 .....      | 陈鸿祥 (34)  |
| 静安先生《颐和园词》本事 .....  | 邓云乡 (53)  |
| 坚净居随笔 .....         | 启 功 (82)  |
| 《无锡国专杂忆》补正 .....    | 黄汉文 (86)  |
| 杨守敬二三事 .....        | 王瑞明 (89)  |
| 梓室随笔 .....          | 陈从周 (94)  |
| 书林琐记 .....          | 雷梦水 (99)  |
| 黄虞稷和他的《千顷堂书目》 ..... | 张明华 (118) |
| 访求王著手书杜诗卷下落 .....   | 周采泉 (125) |
| 薛居正《旧五代史》之谜 .....   | 杨震方 (127) |
| 《筹海图编》和胡宗宪 .....    | 汪向荣 (131) |
| 续谈几种油印书册 .....      | 郑逸梅 (139) |
| 关于《全唐文》的底本 .....    | 葛兆光 (145) |
| 唐代长安的游赏胜地曲江 .....   | 曹尔琴 (148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“梅妃”其人辨 .....            | 卢兆荫 (157) |
| 刘郎浦与螭矶 .....             | 金性尧 (164) |
| 释“刺蜜” .....              | 刘 满 (170) |
| “三顾茅庐”与《隆中对策》志疑 .....    | 刘 啸 (174) |
| 高昌令狐氏的由来 .....           | 王 素 (184) |
| 胡宏生平考辨 .....             | 吴仁华 (189) |
| 北宋的文字狱 .....             | 孙菊园 (196) |
| 略谈宋朝计钱的省陌制 .....         | 李伟国 (203) |
| 楚雨? 零雨?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古籍校勘举隅 .....           | 王同策 (208) |
| 清孝庄后下嫁之旁证 .....          | 牟小东 (213) |
| 浅谈清代日记十种 .....           | 陈左高 (219) |
| 片山潜与姚文栋 .....            | 吕万和 (225) |
| 日本平安时代知识妇女的汉文学修养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九、十世纪中日文学交融的一个侧面 ..... | 严绍璎 (230) |
| 漫谈诗钟 .....               | 熊德基 (240) |
| 壁画漫笔 .....               | 潘絮兹 (255) |
| “蒙汗药”续谈 .....            | 陈良瑞 (262) |
| 读《红氍纪梦诗注》随笔 .....        | 吴小如 (268) |

## 蓼园问学记

牟 润 孙

我能略窥史学门径，是受先师陈援庵先生的教诲，已撰文记述，无待再赘。先师柯蓼园先生对我治经史之学亦启迪良多，师承渊源，未尝一日或忘。今年是柯先生逝世五十周年。爰记侍坐蓼园，问学的大略，以表思念的衷曲。柯先生名劭忞，字凤孙，别号蓼园，山东胶县人，生于道光三十年庚戌（一八五〇），卒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（一九三三）。

蓼园先生的嫂子是我远房祖母（柯敬孺先生的夫人），所以论亲戚，柯先生长我两辈。我二十二岁（一九二九）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。先师陈援庵先生对凤老的哲嗣柯昌泗（燕舲）夸奖过我。一九三一年（辛未），柯先生在家讲学，我始得执经问难，受业于柯先生。那年他已八十二岁，我才二十四岁。由于蓼园先师和先父交谊甚笃，自我十六岁先父弃养后，凤老即对我十分照顾，而我并未将自己研究晚明史的文章向先师去请教，所以我读书治学的情况先师并不知道。凤老听到援庵先生赏识我的话，十二分高兴，晚年讲学，许我列入门墙，成为蓼园门下最小的弟子。事隔五十多年，当时的同学，我只记得周叔迦，其余的人都忘记了他们的姓名。

蓼园先生博闻强记，治学方面至为广泛，经、史、小学、诗、文、金石、历、算，均有极精深的造诣，为钱大昕后第一人。可惜先师的著作编写成书，印行流传的寥寥可数。《新元史》问世后，人们才开

始注意他。其实先师之学，岂只局限于元史之中而已。何况撰《新元史》时，所引中文以外的史料，全部是通过辗转翻译而来的，人名地名的对音往往发生舛错，为人所讥议。依据《新元史》中的讹误，以衡量柯先生在学问上的成就，不能不说是失之于以偏盖全，亦可说是见微瑕而弃拱璧。章太炎评《新元史》说：“柯书繁富，视旧史为优，列入正史可无愧色。”足见凤老在元史方面的成就为与他政治见解相反的章太炎所赞赏。

凤老有一次闲谈时，问我说：“你知道我平生用功最多的是那一部书？”我在此之前，知道先师少年时候为两《汉书》、《文选》都作过补注。先师经史之学与治两《汉书》，盖上绍家学。凤老的父亲柯蘅先生，是陈寿祺（恭甫）先生的学生。《清史列传》卷六十九说他“从寿祺受许郑之学。著《汉书七表校补》二十卷”。先师的祖父柯培元先生曾在台湾作官，著《喀玛兰志略》（大约柯蘅先生随宦到福建，因而执贄于闽侯陈恭甫先生门下）。我那时刚刚问学于先师，如何能了解先师用功最多的是哪部书？先师说：“我四十岁之前，集中精力为《文献通考》校注。不只校勘出《通考》刻本之误，也校出马贵与编撰之误。自有《通考》以来，不用说校，就是从头到尾读一遍者，不知有谁？后来由于捻军战事影响，稿本全失，遂改治《元史》。”凤老于清光绪十二年（丙戌、一八八六）中进士，官翰林院编修。蓼园先生点翰林后，《永乐大典》尚有八千册存在翰林院，其中有世上无刻本流传的元代各家文集及《元经世大典》，先师遂抄录其中有关《元史》材料。稍后又得读柯逢时（巽庵）所藏《经世大典》原本二、三十册，于是奠定了撰《新元史》的基础。

我曾问先师何不撰《新宋史》而著《新元史》？先师说：“只将旧史删改而找不到新材料去增补，则大可不必另撰新史。《宋会要》我见不到，何从撰《新宋史》？”徐松自《永乐大典》中抄出《宋会要》，柯先生当然知道，而《宋会要辑稿》印行，是柯先生归道山以后的

事。清王朝自道光中叶而后，外患日深，有识之士研究西北史地成为一时风气，如龚自珍、张穆、何秋涛、魏源等人皆当时向这方面深入探讨而有成就的人（只龚氏书未成）。先师受他们的影响，是顺理成章之事。

先师出殡之后，学术界开会追悼他。江瀚（叔海）先生在会上致词说：“凤孙先生为经世致用之学，上绍亭林（顾炎武），薄戴（震）、段（玉裁）、钱（大昕）、王（念孙、引之）而不为。民国初年设地政讲习所，请柯先生批改学员课卷，柯先生往往批上千数百言，指陈历代土地政策的利弊得失，如数家珍，无一字不说中肯綮。足见柯先生的典章制度之学的精湛。若非将历朝史志及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等书烂熟于胸中，积蕴了丰富的知识，岂能有如此的表现！”我听了叔海先生一番话之后，才恍然明白了蓼园先师治学的主要宗旨与趣向。魏源、龚自珍等人是清学后期的经世致用派，他们研究西北史地正是为了解西方过去情况，凤老与他们在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的这一方面可以说毫无二致，而在经学上的持论与观点，则柯先生与龚魏以及其后康梁等人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。

蒋复璁曾向柯先生请教，问治史应从何书入手？柯先生说：“你先去读《通鉴》。”他听了之后极不以为然。三十几年前，蒋与我在台湾大学同事，谈起此事，悻悻然说：“我岂能不知道读《通鉴》？”我那时用《通鉴》与正史对读，寻求《通鉴》的取材来源，以研究它的剪裁、取舍、组织、安排等等问题，已经用功数年，了解到柯先生教人读《通鉴》，正是要人通过这个途径去学习温公的史学。蒋氏不能体会先师深意，反而误会了。我自不便加以解说。我因此更发现每朝重大政治、经济、法律各项制度的创立改变，《通鉴》没有漏过一条，的确能举出历代兴衰治乱的本源。凤老治史学又侧重于经世致用，所以教人读《通鉴》为治史学入门之阶梯，可惜他未详细说明，听者遂不能领悟他的意旨。



蓼园先生讲学，开宗明义说：“吾人治学，当讲宋人之义理，清人之考据，不可学阮元（芸台）。阮氏全讲错了。”阮芸台跟着戴震（东原）走。戴东原标榜训诂明，则义理明。攻击宋儒不讲训诂，要人读古书，必须先去讲明古书的训诂，才能了解古书的义理。这话本来不错，但研究一本书的理论，探讨一个人的思想，要从整部书全篇文章去探讨，虽然不可不认识书和文章中所用的字，绝不能只从其中若干字去追求，更不能从若干字原始意义去追求。戴东原为打击宋儒，就说宋儒不讲求训诂之学，宋儒讲的义理不正确。他撰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表面看是从理字的训诂去攻击宋儒，反对宋儒去人欲存天理的议论，实际上则是反对清世宗（胤禛）、高宗（弘历）以理学统治人民。戴氏不敢明白指斥皇帝以宋儒所讲的理学去统治人民，宋儒在戴氏笔下就成了代罪的羔羊。戴氏抨击宋儒的义理之学，只能说戴氏所讲的义理与宋儒不同而已。阮元笃信戴氏，专心致志从字的训诂去讲求义理，作了《性命古训》等文章。凤老不说戴东原错，而说阮芸台错。毫无疑问，柯先生早已明白戴东原所说“以理杀人”，是指皇帝而言，而不是指斥宋儒。傅斯年撰《性命古训辩证》，批评阮氏的误谬，则是凤老去世后数年的事。傅氏不可能受先师的启发或影响，为不待言的事。由此可证客观的理论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，认真去研究，总会得到同一结论。

先师至老记忆力一直不衰退，以八十二岁高龄为我们讲春秋，先《左传》，次《公羊》，最后《谷梁》，经、传、注、疏，手不持卷，背诵如流。发挥《谷梁》传义，详尽明白，结语总是说《谷梁》义最深厚。自从刘逢禄（申受）极力攻击《左传》，说左氏不传《春秋》，龚、魏诸人极力提倡今文之学，申明《春秋》、《公羊》大义。其后康有为采廖季平之说，利用何休解《公羊》黜周王鲁、孔子当素王，著《春秋》乃为汉制法等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，以推行变法维新，于是《公羊》之学大盛。柯先生虽未对学生们明白指斥康有为的学说，而他之著《春

秋谷梁传补注》，主要是针对着刘申受以来盛极一时的公羊学而作，希望能补偏救蔽，其义愿甚为明显。《补注》卷二，桓公二年“孔子故宋”。柯先生说：“《史记》‘春秋据鲁、亲周、故殷’。此公羊家三统之义，然《公羊传》无故宋明文，惟《谷梁传》有之。据此，知二传互为详略。至何休说黜周王鲁，则《谷梁》无此义也。”既说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二传互为详略，又说《谷梁》无黜周王鲁之义，可见柯先生不排斥《公羊》只是不同意何休的黜周王鲁那一系列学说。《补注》卷九，宣公十六年夏“成周宣榭灾。”《谷梁传》说：“周灾不志也。”柯先生指出：“成周灾犹言京师灾。《旧疏》徐邈所据本云：‘周灾至。注云：重王室也’。今遍检范本皆有‘不’字，则不得解与徐同。《疏》‘至’字乃‘志’字之误。徐本无‘不’字耳，徐本是也。外灾不志，宋为王者后，则志，周灾，则志。”宋为王者后，而记其灾，是“故殷”。称成周为京师，记周之灾是“亲周”。证明了黜周之说为何休一家之言，非春秋大义所在。

先师在《谷梁传补注》中不仅不排斥《公羊》，也时时引《左传》以为佐证。柯先生的经学既能通其大义微言，又不废考据。非此短文所能详，容别为一文略述区区所得闻知的一鳞半爪。

凤老极称赞郑杲（东甫）先生的春秋之学，与郑氏交谊甚笃，《谷梁注》中颇引郑氏之说。在门人中则甚称赏陈汉章（伯陶）先生。屡次说：“当代经学，伯陶第一”。陈伯陶先生入京师大学堂受业于柯先生，后来任北大教授。陈伯陶先生记忆力也很强，大约他与柯先生谈论经学时能应对如流，别人很少能在柯先生说到某句经书，当下就接着说出下句和那些注疏等辞句的。据在北京大学听过汉章先生讲中国古代史、中国哲学史等课的人，如顾颉刚先生和亡友范文澜先生都告诉我：伯陶先生上课的确不带书或笔记，在黑板上写出来经书子书，回去核对原书一字不误。

我能知道治旧学的门径，是受梁任公先生影响，从十五岁读他

的《国学入门书目》后，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、《清代学者治学总成绩》都是我很崇拜信奉的书籍。到我受业蓼园先生门下，便时时往太仆寺街柯先生家中请益问难。我曾问过柯先生若干问题，从以下所举问答故事中可以看出先师治学的态度与识见。

我问柯先生：“您著《新元史》，为什么没有《艺文志》？”风老说：“你知道不知道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根据的是汉中秘藏书目？我找不到元内府藏书目，何从为之撰《艺文志》。”我才恍然了解《汉书·艺文志》并非西汉一代所有的书籍目录，而是仅限于汉代中秘藏书。本来读了《汉书·艺文志序》即应认识到这一体例，而我那时读书不细心，竟视而不见。得风老启发我对于各史艺文志、经籍志的体例才知道如何去注意，为我研究目录学开了一条很重要的门径。

我因为梁任公很推崇焦循（里堂）的《雕菰楼易学三书》，就问柯先生：“清儒讲易的书，是不是以焦里堂为最好？”柯先生说：“焦氏的学说并不完全合于易理，他的书不算最好。”我问：“那末清儒中何人讲易最好？”柯先生说：“若讲汉易，当推张惠言的《虞氏易》为上乘之作。”后来，我细读焦氏之书，了解他用比例之法去解易，只能解释易中某些部分，若用它来贯穿全书，则确有牵强或窒碍难通的地方。张惠言（茗柯）所讲虞氏消息，虽也不能尽纳全书于虞氏义例之中，但他能阐明虞氏之学，不背汉儒家法。风老说它是讲汉易上乘之作，张茗柯的书真是比惠栋的《周易述》条理清楚。《续四库提要》（东方文化委员会编）中经部易类的提要全部出于柯先生之手，其中的评论皆极平允适当。

任公先生说王鸿绪将万斯同的《明史稿》据为己有。有一次我对风老说到此事。柯先生说：“你听谁讲的？”我告以梁任公的书如此说。柯先生说：“不然！徐元文请万季野修明史，万先住在徐氏家中，后住在王鸿绪家中，钱名世为其助手，口述笔削撰成《明史稿》。王鸿绪据万稿加以删改，另成《明史稿》，与万氏撰的并不全

同。”后来我看到黄百家、全祖望、钱大昕所撰万氏墓志铭和传，果然与风老述说相同。只是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、《清史稿·万斯同传》所记载的有合有不合。北京图书馆原藏有《明史稿》抄本一部。相传为万斯同史稿。李晋华作《明史纂修考》尝及之，信为真本。是稿抗战前已南迁，无由考校，未敢武断其真贋。后来邓之诚获得《明史列传》残稿六册，经侯仁之与康熙刻本王鸿绪《明史列传稿》逐一考核，断定为王氏的过渡稿。侯仁之的结论是：王氏的史稿不尽采万传，《明史》也不全据王稿；但残稿之中必有本诸万稿的地方（侯仁之的文章发表于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五期《燕京学报》上，题为《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》）。先师之说于是得到了实证。杨椿抨击王氏，妄删史稿，世于鸿绪颇多訾议（见《孟邻堂文钞·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》）。而后魏源承其余绪，斥责王氏说他攘善而不遂其善，盗名而适阻其名（《书明史稿二》），任公先生是采用了魏氏这一说。

梁任公、胡适都极恭维章实斋的《文史通义》，我受梁胡二人的影响，也跟着他们崇拜章实斋。我问风老：“讲史学，是不是应当以章实斋之说为准绳？”柯先生说：“不对，他讲错了。”我心中颇不以为然，又不敢问章氏如何错了，只说：“那末，讲史学应当读什么书？”柯先生说：“刘知几其庶几乎。”我三十多岁后读书较为深入，开始了解《文史通义·言公篇》所讲古无私家著述之事，与另些篇说史学宗旨在于致用。这些说法尚属正确，其余的议论都可商榷。“六经皆史”这个说法在他之前已有人说过，钱钟书《谈艺录》中举出七个人说过六经皆史同样或类似的话，均在章氏之前。我在明何良俊《四友斋丛说》中也找到一条，与章氏同时代的钱大昕撰《廿二史劄记·序》，其中有“经史岂有二学哉”的话。“六经皆史”不能算章氏自己的发明。最重要的是史出于巫，春秋时代巫史尚不分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中，占卜与祭祀的事皆由史主管，讲解灾异天

道的事，也是史的职责。对于这些，章氏都不能详加分析，所以他未指出史与巫的发展关系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书自序》中为什么要说他是重黎之后，为什么要表明司马氏世掌天官，章氏都没有交代。《文史通义》中有易教、书教、诗教、礼教诸篇（章氏自定本《文史通义》无礼教篇，刘翰怡刻《章氏遗书》始据抄本增入），而无春秋之教篇。他说孔子学易是学周礼。又说“周官之法废而书亡。书亡而入于春秋。”既将易、礼与书相混，又以春秋为书的支裔而不是史书鼻祖。章氏只明白史与经同源而未找到经史同源的原始原因，也未探讨明白经史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分开。他把古代史官抄集的典、谟、训、诰编成的《尚书》当作古代之史，亦即先王之政典。他说：书撰述无定法圆而神，司马迁而后惟纪事本末体例最近于书。他实在未能了解司马迁所创的纪、表、书、列传、世家体例的真正意义，更不用说春秋大义了。柯先生说讲错了是很合理的批评。刘知几著《史通》，虽也不能讲明史的起源，但对于传统史书的体例还能了解，批评各家得失也未过份。梁胡二氏以及其他的人，认为纪事本末之体近似于西洋人写历史的体裁，看到章实斋说纪事本末圆而神，立论与西洋人的史书写法相符合，就大力为章氏揄扬。胡适将“六经皆史”也说成“皆史料也”，章氏的本意胡氏都误会了，自无从分辨章氏的误谬。章氏之学是出自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与《周礼》，看他的《校讎通义》即可明白。汪容甫讲古代学制与章氏的学说颇有雷同之处，可惜汪氏的书并未能问世，只保存下来目录，是他儿子记下来的。如果汪氏之书能完成，我相信一定能超过《文史通义》，因为汪氏精通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，其余群经诸子之学也比章氏高明得多。

柯先生诗文都达到第一流水准，有《蓼园诗钞》、《续钞》流传于世，王国维说：“学杜者（李）义山而后有（陈）后山，千年皆得蓼园”，推崇备至。我曾问柯先生：“您的诗有刻本，为什么不印文集？”柯

先生怫然不悦说：“天下哪有以文章为学问的！”说完又莞尔微笑地说：“近代我岳丈和我的世伯都提倡作古文。”原来柯师母正坐在旁边。先师成翰林后丧偶，吴汝纶（挚甫）将比柯先生小二十岁的女儿许配给他。足证吴挚甫很早就赏识柯先生。先师口中的世伯是指武昌张濂卿（裕钊）。吴张皆是桐城派古文大家。先师自称为梅曾亮（伯言）弟子（当然是私淑梅氏），然而他不屑局限于桐城派之中，更不标榜文以载道的旗帜。先师愿作学人，而不愿作古文家，才对我那样讲。如果将论经史之学的文章编成集子，柯先生岂能不允许？

先师精通文字训诂之学，对于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皆有独到的见解，盛赞陈玉澍的《尔雅释例》。教学生用《尔雅》证许（《说文》）为治小学入门之阶。姜忠奎曾列蓼园门墙，他的《荀子性善证》柯先生并不甚以为然。他讲转注，是否得凤老之传？我就不得而知之了。蓼园弟子据我知道陈汉章而外，有著《西夏记》的戴锡章（海珊）和经学家胡玉搢（绶之）。至于余嘉锡（季豫），则为凤老典试湖南时考中举人的门生。柯先生丧礼时，弟子公祭，撰祭文者为吕式斌，主祭是余嘉锡，一共二十余人。杨树达也参加公祭，据他自己说，他哥哥（？）也是凤老在湖南取中的门生。那时，以我为最年少，如今撰文纪念先师，大约蓼园门人惟区区尚存。翘首北望，追怀仰慕之情，固不能尽抒，而先师的学问博大精深，又岂是简陋如我的人能尽窥其堂奥。惟盼先师晚年所校的几部经书稿本尚存人间，还能找到，为之出版，则岂仅我这个不肖门人欣喜欲狂，即对我国传统学术的裨益也匪浅渺。谨在此馨香拜祷，祈求这事有实现之日！

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五日

## 胡小石师的教学艺术

周 勋 初

解放初期，在大学里如何讲授古典文学，是一个崭新的课题。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，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，南京大学中文系为二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“工具书使用法”的新课，并请当时担任文学院院长的胡小石（光炜）先生主讲。这是我们一九五〇年入学的这一届学生接触先生的开始。

先生德高望重，蜚声学坛，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。对于这样一位名教授，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，大家怀着好奇的心情揣摸着。几节课之后，首先使人产生强烈印象的是小石师的记忆力惊人，随之又看到了他学问的博大。

记得有一堂课讲查词汇出处。小石师介绍到《佩文韵府》，并打开原书让同学一一传观，那时先生年事已高，目力不济，对商务印书馆影印的这本书上的小字看不清楚，于是就叫学生朗诵条文，但当学生读到某诗句或某文句时，先生立即背诵出这首诗或前后整段文字，这使大家大为惊讶。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，起初见到先生仪容俨然，不免有些拘谨，日后却又感到即之温然，也就随便了些，于是就有一些人不时提出问题来请教。可想而知，这些问题往往是很幼稚的，而且上下古今，海阔天空，有的还常带有一点“探测”的意思，但先生见到这种情景，总觉得年轻人好奇，求知欲强，因而来者不拒，随方解答，这就更使大家吃惊。现在人们形容记诵之博，往往称这样的头脑象一架电子计算机，那时可还

没有这样的概念，只觉得先生脑海中的知识浩瀚无边。对于一个尚在学问的大门外张望的青年来说，人的智力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，总是缺乏明确的观念，那么如有一位堂庑博大的学者在面前树立起典范，也就可以开拓眼界，激发他奋力向上，小石师的形象就起到了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
世上聪明的人很多，却不一定都能成为学者，先天的材料，还得靠后天的斫削。小石师的父亲季石先生是前清的一名举人，为了培养爱子成为杰出的学者，从小就对他进行严格的教育。清代末年封建学者最正规的治学途径是，先通小学，后通经学，由此顺流而下，再扩及诸子学、史学或文学。因此，一当小石师五六岁时，季石先生就亲自授以《尔雅》。这是第一本启蒙的书。韩愈曾说“周浩殷盘，诂屈聱牙”，但这些文章总还是有文义可循，便于记诵，《尔雅》字字不相联属，太难记了，但小石师年幼时下了功夫，老而不忘，五八年我当研究生，他有一次追忆童年的家庭教育时叙此往事，随口背诵一二条为例，“初、哉、首、基、肇、祖、元、胎、俶、落、权舆，始也。林、烝、天、帝、皇、王、后、辟、公、侯，君也。……”犹如背诵顺口溜一样，可见先生幼学功力之深。

先生的记忆力是这样的惊人，从小又下过这样的苦功，因此每当有人提问时，可以立即打开知识仓库，驱使材料，挥洒自如，令人仰慕。但先生又有非常严谨的治学精神，写文章时，决不专凭记忆，而是严肃地查对原文。不但自己这样做，而且要求学生也这样做。王季思（起）先生是小石师早年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的高第之一，有一次在给青年教师谈治学经验时还提到，他曾送上一篇诠释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的论文，请小石师审阅。季思先生用张华“平吴之役，利在获二俊”的话诠释“论功若准平吴例，合著黄金铸子昂”二句，小石师以为这一典故只能用来说明前句，而后句未有着落，因而让他去查《国语》一书。季思先生始知此处用的乃是《越



语》中勾践用黄金为范蠡铸象的故事。小石师随后又语重心长地告诫说，这些地方“聪明人要用笨功夫”。季思先生拿他早年受教时感触很深的一件小事转而告诫后学，追念先生教诲之情，令人感动。良好的学风，确是需要通过一代代的学者用严格的教育方法传承下去。

照常理想，小石师在大学里工作了几十年，有些课不知教过了多少遍，而他的记忆力又是这样强，可以用不到备什么课了吧，上课时拿一些常识随便讲讲也就够精彩的了。实际情况正与此相反。先生教学极为认真，上课前的一、二天或更多时候，对那些熟透了的课，还是要认认真真从头备起，特别是上课前的那天晚上，更是雷打不动，一定用于备课。不论严寒酷暑，都是如此。南京号称长江三大火炉之一，夏夜的闷热更是令人难以忍受，我曾多次看到先生夏夜伏案备课。一个名满海内的老教授，对他的工作永远是这样的踏实负责，那种挥汗疾书的动人景象，毕生难忘。

小石师掌握了高超的教学艺术，学生之中不管是专攻古典的、现代的或语言的，都爱听他的课。

罗雨亭（根泽）师早年负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，见过不少名师，但他也曾说过，老辈学者一般都不善讲课，象小石先生这样能讲的人，老辈中极少见。

小石师去世时，方曙先（光煮）师曾对我说起，欧洲有些著名的教授，没有什么著作传世，但教学极有水平，有的学生也就著书专门介绍他的教学活动，因为教学本身也是一门艺术，应该作为研究的对象，中国就缺乏这一类的著作，小石师学问固佳，而教学上的成就也极突出，因此曙先师劝我写些东西专门记叙这方面的活动。我以资质驽钝，文笔迂拙，不足传先生风神于万一，故尔不敢草率从事。其后极左思潮日益加烈，更使这类文字无法出现。现在想